

※「魏晉南北朝周邊形象」專輯※

中間地帶的人群：漢至隋代的俚與獠

Michael Churchman* 著 黃文儀** 譯

長期以來，位於東京灣(Tongking Gulf)以北，珠江與紅河流域之間的這塊土地，便基於歷史分析的需要，而被劃分成屬於中國或越南的地區。由於這個地區現在是邊境地帶，為中、越國界所分割，因此，相較於國族中心歷史的大傳統，此地歷史便始終遭到忽視且被邊緣化。其相關歷史書寫，即便在邊界劃定前的時期也是如此。十世紀以前，此地是交趾洋海岸線的一部分。若要將該時期的這個地區清楚劃分成中國與越南史的兩個區塊，需要經歷真正知識上的扭轉(intellectual contortions)，才能區分出何謂「中國的」¹、何謂「越南的」。所以，為了達成此一目的，現代的殖民主義概念便被引進歷史敘事之中²。然而，將中、越之間日後的差異

本文原題為“‘The People in Between’: The Li and Lao from the Han to the Sui”，收錄於 Nola Cooke, Tana Li, and James Anderson, eds., *The Tongking Gulf Through Histo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 Michael Churchman，澳洲國立大學亞洲史博士，目前擔任紐西蘭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語言與文化學院講師。研究興趣包含西元一至十一世紀期間中國嶺南地方史與東南亞大陸史、東南亞的中文克里奧語（尤其是馬來客家語）、中國境內與海外離散族群之間南方人的地方認同、以喃字寫成的越南文學等。已出版的專著有 *The People between the River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Bronze Drum Culture 200-750 CE*（紅河與珠江之間的人們：西元 200 至 750 年銅鼓文化的興衰）(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6)。

** 黃文儀，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¹ 當作者使用這些用語時，深知在本文討論的時代裏這些詞語有時代錯置的問題，如同它們源起的現代國家。同樣地，珠江與紅河這兩個詞也犯了時代錯置的毛病。儘管如此，我還是使用它們，而非那時期使用但較少人知道的鬱與濮。

² 當「殖民主義」這個詞被應用在曾為漢帝國的一部分，但現在是獨立國家的領土（如越南北部和南韓），而非用在邊境地區（如雲南和滿洲）時，此詞的時代錯置問題，便變得顯而易見。畢竟雲南或滿洲這些邊境地區，如同那些今日已隸屬其他民族國家的領土一般，對漢人「中國」而

投射到對過去的解讀，或許能合理化當下的政治結構，但代價卻是忽視或刪改歷史的真貌。

本文的討論對象是我稱之為俚一獠地區的居民。這群人的語言或許以侗台語系為主，但他們的居住區域遠大於今日中國南方的侗台族群所住的範圍。在西元三至六世紀（六朝時期），他們的領土從現今廣東、廣西南方海岸，一路延伸至紅河平原東部與珠江三角洲西部、南部一塊廣大的土地。這意味著，在當時廣州（Guangzhou）³—交州間所有陸路往來，必須通過俚一獠的領土。如同一些文獻記載所顯示的，俚一獠人的活動讓中華帝國與紅河三角洲居民之間的陸路交流變得極為困難。其結果是，中華帝國與紅河三角洲之間的往來由陸路轉向海路，儘管走海路也有風險。

許多發現於這個區域的銅鼓，形制相近且年代大約同時，在在顯示此處曾出現一個有權、富裕的領導階層，他們在文化上不受中華帝國政府的制約，儘管他們居住的中間地帶位處兩個政府力量相當強大的區域之間。幾世紀以來，俚一獠的位置與勢力讓華夏人群只能定居在現今廣州城（Canton）的南部與西部，同時也削弱中華帝國對紅河三角洲一帶及其更南方土地的有效直接控制。如同下文將揭示的，俚一獠介於中間的位置，以及他們對抗帝國強鄰的能力，將會在東京灣地區另一人群——他們在現今越南北部紅河平原的鄰居——的歷史上扮演主要角色。

然而，進入正文之前，有一點需要說明。當我們討論古代中國文獻裏記載的周邊地區人群時必須明白，這些作者依據的是，長期以來的傳統替他們所認為異於自身的周邊族群命名，而此一傳統與其說與被命名者在任何意義下的族群自覺相關，不如說與中國地理、文學的成見（preoccupations）更有關聯。大多數中文論著（以及部分西方漢學著作）的主要弊病之一在於，作者處理古代族群名稱時，總以為中文文獻裏的一個名字必然指涉名字以外的一個客觀實體⁴。基於這個對名字與實體一致性的假設，已有不少著作出版，皆在探討名稱時空分布及其擁有這些名稱者在文

言，皆宛如異國。

³ 此處「廣州」指的是較大的行政單位，其治所是同名的城市。為了避免讀者混淆兩者，當我提到廣州城時將會使用其英文譯名“Canton”，儘管此種用法有時代錯置的問題。

⁴ 以此種方式討論俚、獠、烏澹的論著，可見蔣炳釗：《百越民族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年）；胡守為：《嶺南古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王文光等撰：《百越民族發展演變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獻記載裏的行為⁵。不過，在許多例子中，這類名稱的地理分布，卻遍布在沒有任何單一考古文化或語群與之對應的區域。這個現象顯示，這些名稱往往只是「化外之民」(barbarian)的本地稱呼而已。

記錄這些名字的中國史家，通常受到早期文獻模式的影響。他們對這些人群之間的差異並不特別感興趣，也不夠熟悉。舉例來說，成書於十世紀的《太平寰宇記》記載夷、蠻散布在嶺南地區（現今廣東、廣西與越南北部），但這兩個名字源自於幾乎兩千年前對周王朝周邊民族的標籤，因此，除了告訴我們《太平寰宇記》的作者視嶺南地區人民為化外之民，別無其他訊息。同樣地，關於地方風土的描述也來自個別作者對早期文獻的閱讀所得：在許多例子中，這些描述與其說是對行為的第一手觀察，不如說是「套語」⁶。綜合種種考量，我們不僅要小心把這些古代的中國族群名稱當真，而且在歷史上不是很恰當地運用這些名字去標誌古代人群時，也必須有所警覺。若要將某些古代族群身分加諸在俚一獠人身上，唯有忽略與其名字相關的考古文化之多樣性方才可能。

何謂俚、獠？

我們應牢記在心，關於這些在中文文獻裏多半稱為俚或獠，有時稱為烏潯的「中間地帶的人群」，我們究竟知道多少？在「獠」一詞用來指稱居住在珠江流域的人們之前，此詞主要用來稱呼住在今日貴州與四川的人。其最遠，往東到達現今福建南境，往西南到達紅河三角洲西部山區⁷。因此，「獠」這個單詞或許原指住

⁵ 有兩本著作提到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特別牽涉到單一越民族的概念，分別是 Heather Peters, *Tattooed Faces and Stilt Houses: Who Were the Ancient Yue?* (Philadelphia: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0); William Meacham, "Is an Anthropological Definition of the Ancient Yue Possible?" in *Lingnan guyuezu wenhua lunwenji* (Collected Essays on the Culture of the Ancient Yue People in South China), ed. Chau Hing-wa (Hong Kong: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1993), pp. 140-154.

⁶ 例如，相當常見的「斷髮文身」源自《莊子·逍遙遊》，其詞義原先指涉越國（約在現今上海地區）人民的風俗，爾後無論此詞在何處使用，卻變得與「越」一詞相關。

⁷ 根據《梁書》卷三的記載，交趾李賁被梁軍擊敗後逃入獠洞。這顯示獠這個名稱也用來稱呼紅河平原西部的人群。值得注意的是，這條資料與以下所有中文一手文獻的引文是以木刻版書籍的卷為主。「卷」原本指的是實體分開的書卷，但現在也用來指稱書的章節。傳統上，木刻版書籍的

在北方更遙遠山區的「化外之民」，遠早於此詞被用來指稱住在珠江南岸低丘的人們⁸。「俚」的原義相當隱晦。作為一個單字，「俚」的最早字義是「粗俗」或「土包子」；作為一個族群名稱，「俚」最初在文字記錄中是用來指稱一群住在漢帝國之外、靠近九真（今越南北中部的高地）的人們⁹，其居住地區距離珠江流域相當遙遠。在六朝時期，「俚」未曾用來稱呼廣州城以東的人群。相反地，此字使用區域主要在珠江中游的省分，包括左江、右江匯流處之間，且一直到廣州城的地區。六朝之後，此字也許跟海南黎族的「黎」相混淆，儘管兩字原本發音不同¹⁰。在所有詞彙中，「烏澹」是最具在地特色的一個名稱。此詞主要指稱住在大約現今南寧、橫縣地區，但偶爾會遠至西邊靠近交州領土的人¹¹。

中文學界一般同意夷、蠻兩詞意指「化外之民」，但俚、獠、烏澹指的是族群分類(ethnic groupings)。後者這三個詞是否確實反映其指涉對象彼此間的真正異同，是一個重要但備受忽視的問題。為了更瞭解古代文獻中族群名稱的意義，依賴文字記載是不夠的，因為歷史語言學及考古資料常與其有所抵觸。俚、獠兩詞的廣泛分布正是一個恰當的例子，其現象暗示這兩個詞不總是指稱兩個獨立的族群，或甚至指稱說同一語族語言的人們¹²。例如，俚的文字紀錄首先出現在九真，接著出現在珠江南岸地區與廣州城西邊的海岸地帶。這兩個區域的居民非常有可能分屬澳亞語系與侗台語系，而這兩種語族差異之大讓兩者的關係至今仍未有定論¹³。

頁數是用「左半葉」及「右半葉」。下文凡二十四史頁碼皆依此格式標示。

⁸ 由這個詞的分布，可知「獠」似乎原本與高地人群有所連結，而非住在平原的人們。然而，五世紀左右，「獠」變成更普遍的詞，跟「俚」可以互用。

⁹ [劉宋] 范曄：《後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百衲本二十四史》本），卷86，葉9b。下文所引二十四史皆引自此版本，不一一注出。

¹⁰ 雖然在普通話中，此兩字目前只有聲調上的差別，但在廣東話與漢一越語中，兩字的音節截然不同。

¹¹ 關於這三個詞的字義轉變及其地理分布的全面考察，參見芮逸夫：〈僚人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1975年），頁727-771。芮逸夫也相信，根據文獻中記載的文化特徵，學者確實有可能將俚、獠、烏澹區分為三個獨立的族群。

¹² 在四川與紅河這樣遼遠的區域，人們極度不可能只講屬於同一語族的「獠語」。此外，有時候連俚、獠也會混淆俚、獠兩個詞。例如，《陳書》記載一場針對夷、獠的戰役，其結果是俘虜了一名叫做陳文徹的人。然而，《梁書》卻記載陳文徹是「俚帥」。見〔唐〕姚思廉：《陳書》，卷9，葉6b，以及姚思廉：《梁書》，卷32，葉11b。

¹³ 關於這兩個語族的關係依舊懸而未決。即便它們有所關聯，其共同祖先仍遠早於本文討論的時

儘管有謹慎的必要，我還是為了方便而使用「俚—獠」來指稱所有住在珠江南岸直至海邊的侗台族群（包括烏滸）。我也使用「俚—獠地區」(Li-Lao country) 指稱他們的居住地。「烏滸」在三世紀之後便不為一般人所使用。而且，雖然蠻、夷為人常用，但這兩個詞是一般性用語，與珠江流域沒有特別關聯¹⁴。即便如此，應該注意的是，珠江北岸也有稱為俚、獠的人群，但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南岸的俚—獠

如果我們根據唐宋的相關記載，在地圖上找尋蠻、夷、俚、獠、烏滸的位置¹⁵，會發現俚—獠在唐宋時期依舊占據所有沿海的州 (provinces)，並特別集中在珠江地區。但他們卻不見於珠江與海岸之間、合浦東邊的少數州¹⁶。這個現象很不尋常，因為這些地方離主要河道和海岸最為遙遠，而且是銅鼓出土的高度集中地區。有可能是這些州依舊相當偏僻，以致當地居民被認為不值得一提。另一個可能性是，遲至晚唐時，對中國史家而言，這些人的語言風俗已經十分相近到不會認為他們是異族。

在西元前一、二世紀，新臣服的帝國西南地區的人民被泛稱為駱越與西甌。直到東漢，「烏滸」這個具地方特色的用詞方才出現，指稱住在廣州城與紅河平原之間的人群。

當烏滸一詞顯示俚—獠地區的權力均勢之際，烏滸人似乎原本對帝國統治頗有好感。不僅一百多年來俚—獠地區沒有發生任何叛亂，而且西元一七〇年，由於一萬名（譯者按：應為「十餘萬」）烏滸人的投降，地方官員還在烏滸人的領土上設置了七個縣。但是，八年後交趾、合浦郡的烏滸人卻掀起一場長達四年的叛亂，將他們南方、西方所有郡縣的數萬人都捲了進去¹⁷。至漢末時，俚—獠人已是一股不可

代，因此，與俚、獠是否為廣義詞的問題無關。

¹⁴ 「蠻」通常用來指稱南方民族，而「夷」是一個早已喪失「東方化外之民」原義的一般用詞。然而，隨著中國人的地理知識增加，這兩個詞用來指稱更遙遠的族群。

¹⁵ 亦即，宋代地理百科全書《太平寰宇記》和《輿地紀勝》。沒有更早期的文獻以完整的形式流傳下來。唐代的《元和郡縣圖志》，很可惜地遺失了幾個關於嶺南中部的篇章。

¹⁶ 這些州是春州、循州、甯州、禺州，皆位在今日鬱林、陽江和容縣所形成的三角區域中。

¹⁷ 范曄：《後漢書》，卷 86，葉 4a。史書中用同音字「里」來指涉「俚」。

忽視的力量。在三國、六朝文獻中，也經常可見關於他們是如何棘手難纏的描述。其中，早至西元三世紀，已有他們威脅廣州、交州間陸路交通的文字記載：

烏潁，地名也。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恆出道間伺候行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¹⁸

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逋逃之藪。¹⁹

在一道呈給晉文帝（譯者按：應為「晉武帝」）的奏摺中，交州刺史陶璜便提供有關這群化外之民的詳盡資訊：

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才五千餘家。²⁰

一條劉宋時期的記載，也提到俚一獠帶來的威脅非但是當前危機，也是沉痾：

廣州諸山並俚、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為侵暴，歷世患苦之。²¹

南齊的兩條記載也持類似的論點：

廣州，鎮南海。濱際海隅，委輸交部，雖民戶不多，而俚獠猥雜，皆棲居山險，不肯賓服。……別置督護，專征討之。²²

越州，鎮臨漳郡，本合浦北界也。夷獠叢居，隱伏巖障，寇盜不賓，略無編戶。……元徽二年，以伯紹為刺史，始立州鎮，穿山為城門，威服俚獠。²³

上述引文的年代跨越了約莫三個世紀，皆顯示大批俚一獠地區的住民不受歷代中國王朝的管轄。在同一時期的紅河三角洲，統治或由中央指派的官員執行，或由華夏人群與本地人通婚生下的地方強人所執行。他們表現得時而像是獨立的實質領袖，

¹⁸ 《南州異物志》是孫吳時期的作品，在〔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786，葉3b中有引用。

¹⁹ 〔晉〕陳壽：《三國志》，卷53，葉10b。

²⁰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57，葉6a。

²¹ 〔劉宋〕沈約：《宋書》，卷97，葉4a。

²² 〔梁〕蕭子顯：《南齊書》，卷14，葉20a、b。

²³ 同前註，葉25b、26a。

時而像是順從的帝國官員²⁴。漢代時期，現今越南北部的地區是主要貿易中心之一。從北方來的華夏人群定居在該地²⁵，而且該地深受漢字學習和社會風俗影響的時間遠早於今日廣西的俚一獠地區。據史書記載，漢光武帝在位期間，交趾太守錫光與九真太守任延皆在地方設立學校、引進漢人服飾和婚俗²⁶。史書也記載受過教育的當地人士，無論他們是土著或居民；東漢末年與三國時期士燮統治時尤其如此。在漢代中期至三國的這段時間裏，許多人為了避難，從中國北方逃往紅河三角洲及大約現今廣州城周遭地區²⁷。但是，沒有紀錄顯示這些人逃向俚一獠地區，後者當時也尚未設立郡縣，以接納來自北方的難民。

通往交州的海路與陸路

在唐以前，北方到紅河三角洲的陸路交通鮮為人知。即便是《後漢書》也沒有記載，西元四十一年馬援遠征徵氏姐妹時，採的是陸路。馬援的傳記僅提到其軍隊「至合浦」，然後從合浦「緣海而進」²⁸。我們之所以知道他由陸路抵達合浦，是因為其他記載提供了線索。其中一條史料提到他「修道橋」、「通障谿」，而且率領長沙、桂陽、零陵、蒼梧的士兵²⁹。尤其是從蒼梧出發到合浦的陸路遠征，比廣州城出發的海路征討更有可能。最為人所知的一條陸路路線必須通過鬼門關。此路線從今日珠江支流北流順流而上，靠近位在蒼梧西南方的北流源頭，接著過鬼門關，到達今日南流的源頭，終點是濱海的合浦。馬援採這條路線攻打徵氏姐妹的最早記載在《舊唐書》中，而且從該條史料我們可以知道，至少最晚在唐代時，這條路似乎已

²⁴ 關於這個階層如何形成的細節，見 Keith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48-57。關於三國、六朝時期此地區行政系統的詳細討論，見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pp. 70-151。

²⁵ 出土漢磚室墓的地區也顯示，漢人聚落的分布限於海岸與河岸地帶，如廣州城、梧州、合浦、徐聞、紅河三角洲地區及其南方的土地（今義安、清化）。

²⁶ 范曄：《後漢書》，卷 24，葉 12a。

²⁷ 陳壽：《三國志》，卷 49，葉 9b 指出，士燮在交州的統治期間，數以百計的學者為了避難，遠從中國（意指現今中國北部）南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劉熙、他的弟子薛綜，以及《理惑論》作者牟子。

²⁸ 范曄：《後漢書》，卷 24，葉 12a。

²⁹ 同前註，卷 86，葉 10a。

被認為是古道了³⁰。

鬼門關這條路線會帶領旅人直接通過俚一獠地區的心臟地帶。中文史料暗示，當時的旅人認為該地相當危險，他們也親身經歷過該地，並了解該地人民如何不易相處。但作者們聽到的，都是誇大之詞與轉過幾手後旅人的奇聞軼事。因此，烏潯人被認為會吃掉新生兒，而且他們認為人掌、人足是珍饈³¹；為了妥善埋葬亡者，俚人必須趕走蜂擁而來的吃人屍的甲蟲³²；中了他們毒箭的人會肉爛骨見³³。一條關於通過俚一獠地區陸路有多麼危險的記載之所以比較可信，是因為主人翁是張融。宋孝武帝封張融為封溪令，其地在今日紅河三角洲。當張融前往封溪上任時，不幸落入獠人之手：

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³⁴

這則史料表明，張融在廣州、越州邊界被抓，剛好直接穿越俚一獠地區。不過，史料並未說明張融被釋放後走哪條路線至交州。但《南齊書》隨後引用了〈海賦〉，其長度與複雜度暗示張融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在海上，因此脫逃之後，張融或許回頭從廣州城出航。這則史料證實，俚一獠人對任何膽敢通過其土地的人構成真正的威脅，尤其對那些只有孤身一人或三五結伴而行的旅者更是如此。相較之下，頻繁進出紅河三角洲的軍隊，卻很少受到本地人的攻擊³⁵。

從銅鼓看俚一獠社會

假如史書顯示俚一獠對中華帝國是一個尾大不掉的麻煩，文本和考古紀錄卻也揭示，約莫同時，俚一獠地區有一個興盛的銅鼓文化存在。這反映兩件事情：這些人的經濟實力，以及地方領導階層傳統的長期號召力無關乎中華帝國政府所給予的

³⁰ [後晉]張昭等撰：《舊唐書》，卷41，葉41a。

³¹ 《南州異物志》，引自范曄：《後漢書》，卷86，葉7b。

³² [晉]張華：《博物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卷2，頁15。

³³ 同前註，頁10。

³⁴ 蕭子顯：《南齊書》，卷41，葉1b。

³⁵ 六朝時期的具體證據相當少。《宋書》記載，晉義熙七年(410)叛賊盧循從始興逃往其葬身之地交州。但該書只說盧循從合浦往交州。見沈約：《宋書》，卷92，葉5a。

聲望。

雖然銅鼓鑄造源出滇地（今雲南中部），靠近紅河、珠江的源頭，但最晚在漢末時，銅鼓已不再由滇製造。反之，銅鼓技術已經傳往下游，遠至紅河三角洲與現今廣西北部。俚一獠地區主要生產黑格爾 II 式銅鼓，這類銅鼓在設計上異於雲南、越南早期 I 式銅鼓。中國學者通常認為，黑格爾 II 式銅鼓直接承繼了雲南發現的 I 式銅鼓。然而，日本學者吉開將人相當有說服力地指出，銅鼓與銅鼓鑄造技術乃是從紅河下游傳入俚一獠地區，而非直接由滇而來。他的關鍵論點是，俚一獠地區的銅鼓在鑄造前已在模組上進行裝飾，此一創新方法並非沿用以往在成品上進行裝飾的方式³⁶。左江花山岩畫中的二百五十個以上銅鼓，似乎支持吉開的說法³⁷。左江的發源地提供從紅河平原到俚一獠地區的簡單陸上通道。許多 I 式銅鼓已在左江北岸發現³⁸，而且有些學者主張花山岩畫中也描繪了 I 式銅鼓³⁹。右江相對缺乏銅鼓的發現——倘若銅鼓鑄造技術直接從滇傳進俚一獠，將會令人十分驚訝——也暗示俚一獠銅鼓傳統源自紅河平原，而非直接來自於滇，這個中國學界偏好的解釋。

先行研究告訴我們，銅鼓鑄造或許始於漢代的俚一獠地區⁴⁰。尤其是東漢的事件，特別是西元四十年徵氏姐妹的叛亂，促成銅鼓由紅河平原傳入中國。雖然徵氏姐妹的反叛起於紅河三角洲地區，但也吸引了九真、日南，以及更重要的合浦土著（中國文獻中通稱為「蠻」）的參與⁴¹。合浦蠻涉入這場叛亂暗示，紅河三角洲與合浦地區地方首領間的緊密聯繫，而這種聯繫遠在帝國官員及行政單位的世界之外。這場叛亂間接表明，某種類似於以「一名豪傑」（在這個例子裏是兩名女豪傑）為中心的曼荼羅政治模式的存在。紅河三角洲強人領袖的強大吸引力，極可能讓銅鼓在其追隨者眼中成為一種地位的象徵，並促使左江地方首領必須打造銅鼓，以作為自身領導權威的象徵。很有可能，類似的過程再度將銅鼓帶往北方的俚一獠地區，其

³⁶ 吉開將人：〈銅鼓「再編」の時代——一千年紀のベトナム・南中國〉，《東洋文化》第 78 號（1998 年），頁 199-218。

³⁷ 王克榮等撰：《廣西左江岩畫》（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頁 193。

³⁸ 吉開將人：〈銅鼓「再編」の時代——一千年紀のベトナム・南中國〉，頁 212-213，圖 8、9。

³⁹ 王克榮等撰：《廣西左江岩畫》，頁 204。

⁴⁰ 蔣廷瑜：〈粵式銅鼓的初步研究〉，中國古代銅鼓研究會編：《古代銅鼓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頁 152-160。

⁴¹ 范曄：《後漢書》，卷 86，葉 9b。

地區的經濟環境，包括豐富的銅礦礦藏，讓銅鼓生產再度興起。當銅鼓生產從左江南岸傳入俚一獠地區之際，銅鼓設計已有極大的變化，變成黑格爾 II 式。這些銅鼓主要發現於珠江南邊和西邊。相較於紅河三角洲的東山銅鼓，俚一獠地區黑格爾 II 式銅鼓的生產還繼續運作了至少四百年，儘管紅河三角洲東南方的山區仍持續生產 II 式銅鼓。

銅鼓可以為我們闡明俚一獠的社會、經濟狀況。關於這些銅鼓對俚一獠文化、社會的重要性，晉代的《廣州記》提供了最貼切的描述：

俚獠貴銅鼓，惟高大為貴，面闊丈餘，方以為奇。初成，縣於庭，克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其中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鼓，竟留遺主人，名為銅鼓釵。風俗好殺，多構仇怨。欲相攻擊，鳴此鼓集眾，到者如雲。有是鼓者，極為豪強。⁴²

這段文字說明了好幾件事情：銅鼓主人非常富有，且在其群體中相當具有影響力。他們彼此間的爭鬥會涉及人數相對眾多的戰士，而他們內部的戰爭跟帝國政府的勾心鬥角無關。在俚一獠地區集中發現銅鼓的事實暗示著一個地方首領傳統的存在，這與周遭地區（包括紅河三角洲地區）由帝國任命官吏的體系相當不同。銅鼓的發現，也反映了一定程度財富的存在，得以提供地方首領這些不易製造的大型奢侈品，同時提供年輕人可以用來擊鼓的金銀釵。文字紀錄也指出，俚一獠首領自何處取得這些物質財富。在宋代初期，位處俚一獠地區中心的橫州、貴州便以生產金、銀而聞名，而寧浦（今橫縣）在晉朝時則有「金城」之稱⁴³。

在俚一獠地區的東京灣一端，同樣有盛產珍珠、珊瑚、熱帶水果、翠羽、香料等奢侈品的地區。一些證據暗示，俚一獠人收集與交易這些物產。例如，一條關於烏潯人的詳盡記載便顯示這些人也參與收集翠羽與珍珠⁴⁴。合浦的採珠業十分有名，即便官方明令禁止這種行為，當地人也會採珠私用⁴⁵。西元八十九年，鬱林郡採到周圍三寸的珍珠。西元一〇三年，鬱林降民發現周圍五寸的大珍珠⁴⁶。位處合浦東邊的

⁴² 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 785，葉 8b。

⁴³ 出自於已佚失的劉宋沈懷遠著作《南越志》。此佚文引用自〔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卷 166，頁 3181。

⁴⁴ 《南州異物志》，引自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 786，葉 3b。

⁴⁵ 同前註，卷 803，葉 10b。

⁴⁶ 《古今注》是一部晉朝作品，引自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 803，葉 5a。事實上，鬱林郡的管

化州、白州也以珍珠聞名⁴⁷。據說，白州有一條叫做「綠珠井」的溪流，一名梁朝（譯者按：應為「西晉」）官員曾在那裏收集了三斛珍珠⁴⁸。珊瑚也是東京灣非常珍貴的物產，而且必須以鐵網打撈⁴⁹。鬱林甚至有珊瑚市，讓海客可以出售他們捕獲的珊瑚⁵⁰。最後，一條三國時期的孤證記載蒼梧高要縣山中（譯者按：《太平御覽》僅記載蒼梧）產荔枝（一種相當受北方人喜愛的熱帶水果）⁵¹。

假如透過交易俚—獠地區出產的奢侈品便能獲利，那麼獲利者不可能僅限於外地人。因此，在銅鼓高度集中生產地區的俚—獠首領的物質財富，或許取決於北流地區豐富的銅礦及奢侈品貿易。無論他們的財富從何而來，史料顯示四世紀晚期廣州境內的俚—獠可以獲得大量銅錢，以致他們不覺得銅幣多麼稀有。西元三七八年，皇帝在一道詔書中抱怨：

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⁵²

此處的「廣州夷人」，無疑指的是廣州城以西、珠江南岸的俚—獠，畢竟該地是廣州地區唯一出產銅鼓的所在。詔書宣稱廣州地區「素不出銅」，意味官員對於交州、廣州一帶無知的程度，也顯示擁有豐富銅礦的俚—獠地區腹地遠在晉朝廷的知識與掌控之外⁵³。

廣州夷人對獲得銅錢以用來鑄造銅鼓的渴望，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其首領似乎不在帝國貨幣經濟體系之內，反而對於銅鼓所帶來的地位和聲望更感興趣，而這類社會考量全然異於一個與中華帝國相關的官僚體系和書籍學習的世界。銅鼓訴諸的

轄範圍並未遠及海岸，所以，珊瑚、珍珠的上貢很可能來自合浦海邊。

⁴⁷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67，頁 3196。頁 3199 也提到這兩地的珍珠相當出名。

⁴⁸ [唐] 劉恂：《嶺表錄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卷上，頁 2。「綠珠」是一個女人的名字。

⁴⁹ 《吳錄地理志》是晉代張勃的作品，引自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70，頁 3252。

⁵⁰ 《述異記》是一部四世紀晚期的著作，引自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 807，葉 4b。

⁵¹ 出自《吳錄地理志》，引自同前註，卷 971，葉 8a。

⁵²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 26，葉 11a。

⁵³ 在黑格爾 II 式銅鼓發現最多之處的今日北流、鬱林兩地，擁有非常豐富的銅礦。六朝時期以來，三個銅鼓生產地也在北流附近，正好在 II 式銅鼓出土最集中之處的核心地區。見姚舜安等撰：〈北流型銅鼓鑄造遺址初探〉，《考古》，1988 年第 6 期，頁 556-561。

是地方感性 (local sensibilities) 與品味，提供一個更吸引人的權威象徵，有別於帝國賜予的封號。從漢至隋，無論是在俚一獠地區，或在難以取得銅礦的俚一獠地區東部邊境，銅鼓都相當受歡迎。對我而言，這意味著，住在俚一獠地區邊緣地帶的非華夏人群，並不是從廣州城等城市或華夏人群裏找到社會組織的效法對象。他們反而受到俚一獠腹地中擁有銅鼓的首領的吸引，如同幾世紀前加入徵氏姐妹反叛的合浦人一樣。相對地，在三世紀晚期，紅河三角洲的統治階級滿足於帝國承認他們是地方領導者所帶來的合法性，而且考慮到紅河地區中游缺少銅鼓的發現，或許他們已開始認為，擁有銅鼓是一種落後的習俗⁵⁴。倘若如此，一個有趣的歷史問題是，現代歷史學者與某些古代記載中所發現的交州的獨立傾向。

Keith Taylor 觀察到，交州「具備自身的、獨立於帝國之外的政治動力」。他又補充，「當帝國深陷危機之際，便是南方興盛之時」⁵⁵。Taylor 的這些看法是一個更大論點的一部分，他將這些觀察歸因於「中國人」與「越南人」之間清楚的差異。對他而言，「越南人」地區的穩定只有在地方首領的治理下方才可能，強大的「中國」只會導致混亂。但是，對於 Taylor 所以為的「因」（獨立地方領袖的傳統）和「果」（一個不同的政治動力，傾向將交州孤立於中華帝國的其他地區），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正因交州孤立於中華帝國其他地區之外，地方首領因而得以鞏固自身地位。季風週期控制危險的海路，況且魏晉南北朝時期，前往紅河三角洲的主要陸路直接穿過銅鼓生產最為集中的核心地區，並通過一個獨立、好戰民族的領土。是故，銅鼓的生產讓紅河三角洲得以自外於帝國的其他地區。下面對南齊時交州叛亂的兩條評論，已顯示此點：

交州夔絕一垂，寔惟荒服，恃遠後賓，固亦恆事。⁵⁶

交州斗絕海島，控帶外國，故恃險數不賓。⁵⁷

交州的孤立位置，也反映在三國之後移居紅河三角洲地區的華夏人群十分稀少，而

⁵⁴ 有趣的是，直到二十世紀，越南人才意識到銅鼓對紅河三角洲人群的特殊社會意義。現存最早的越南史書陳朝 (1225-1400) 的《越史略》甚至沒有提到銅鼓。

⁵⁵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p. 113.

⁵⁶ 蕭子顯：《南齊書》，卷 40，葉 6b。

⁵⁷ 同前註，卷 58，葉 15a、b。

且相較於湧入大批北方難民的俚—獠地區東部，交州的編戶數目逐漸下降⁵⁸。祖先原先來自中國的本地家族，如杜氏和李氏，便能利用這種孤立來統治這個半獨立於中華帝國之外的地區。六朝時期這股傾向的高峰，出現在六世紀中期李賁的起義。

俚—獠的結局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六朝時期的南方帝國皆避免對俚—獠大規模用兵。東晉與劉宋兩代盡量不去碰觸俚—獠問題。然而，陳、梁（譯者按：應為「梁、陳」）時期，當許多試圖控制俚—獠的戰略開始出現，頻繁攻擊他們的相關記載也隨之增加。一條東晉時的記載顯示，俚—獠人跟東晉百姓有貿易往來，而且由此獲得武器（或許是鐵器），《晉書》記載，在三世紀晚期：

〔廣州刺史〕滕修數討南賊（作者註：非常可能是俚—獠的別稱），不能制，〔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修從之，果破賊。⁵⁹

另一個控制俚—獠的策略是，藉由委任權威給俚—獠首領，將他們納入帝國行政體系。劉宋大明年間（457-465），合浦大帥陳檀歸順，受封為龍驤將軍。大明四年，他上書乞求率領官軍，以討伐那些尚未臣服的人。朝廷封陳檀為高興太守，獎勵他效忠劉宋⁶⁰。雖然文獻並未說明陳檀究竟是俚或獠人，但他原先的稱號「大帥」屬於一個地方首領所有，而非一名帝國官員。唐朝廷也在合浦地區採取同樣的手段，希望可以一舉打通鬼門關的交通⁶¹。

陳朝太建八年（576），沈君高被任命為廣州刺史。根據沈君高的傳記顯示，他其實是一個沒有軍事才能的文官。因此，他選擇用和平手段對待俚、獠。其傳記提到，俚、獠之間世代為敵，但在沈君高持續不懈的努力下，得以維持和平局面。然而，不幸的是，出任廣州刺史兩年後，他便死於任上⁶²。沈君高對待俚、獠的方式似

⁵⁸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pp. 56-57, 120-121.

⁵⁹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 57，葉 5a。這大約發生在孫吳末年，當陶璜為蒼梧太守之時。

⁶⁰ 沈約：《宋書》，卷 97，葉 4a。

⁶¹ Edward Hetzel Schafer, *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 31.

⁶² 姚思廉：《陳書》，卷 23，葉 3b。

乎並不尋常。通常控制俚、獠的手段，是出兵攻打頑強的俚、獠地區。許多關於這些征伐的記載，始於劉宋，而大量出現於國祚短促的梁、陳兩代。

在宋、梁、齊、陳（譯者按：應為「宋、齊、梁、陳」）時期，南方朝廷曾發動多次針對晉康⁶³、越州⁶⁴、鬱林⁶⁵、新州⁶⁶與番禺⁶⁷俚、獠人的攻擊。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條記載來自梁代，與銅鼓文化有關。一個名叫歐陽頴的人，隨衡州（今湖南）刺史蘭欽南伐「夷獠」。他（譯者按：應為「他們」）生擒了陳文徽，同時「所獲不可勝計」，包括「累代所無」的大銅鼓，後來獻給了皇帝⁶⁸。這個銅鼓的尺寸暗示，此物可能是黑格爾 II 式銅鼓，而非尺寸較小的 I 式銅鼓；同時也暗示，歐陽頴一行人的討伐對象是南岸的俚、獠。有些小規模的攻擊顯示，是正規軍事討伐的一部分。例如，在陳宣帝末年，廣州刺史馬靖與其訓練有素的軍隊每年深入俚洞，而且屢傳戰捷⁶⁹。

沒有任何紀錄顯示，六朝時期有哪個南方帝國曾對俚、獠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他們的失敗似乎來自小型交戰。一次重要但短暫的深入俚、獠領土的行動，發生在高涼地方首領冼夫人與高涼太守的聯姻之後。自此，冼夫人忠心支持陳、隋政權⁷⁰。然而，冼夫人的後代與俚一獠地區的其他人，卻讓俚一獠與唐帝國的友誼破局。研究唐代叛亂的薛愛華（Edward Hetzel Schafer）如此描述相關事件的發展：

早在七世紀，唐朝開始開發南方後，當地人的反抗就集中在西邊的邕州與容州，尤其是廣州城和河內之間的沿海縣。馮、甯兩個部族在反抗中的角色始終相當鮮明，經常威脅通往南越的主要交通幹道。⁷¹

⁶³ 沈約：《宋書》，卷 54，葉 10b。晉康位於珠江南岸，靠近雲開山脈。

⁶⁴ 蕭子顯：《南齊書》，卷 14，葉 25b、26a。南齊設立越州以軍事手段控制俚一獠。

⁶⁵ 姚思廉：《梁書》，卷 47，葉 4b。

⁶⁶ 姚思廉：《陳書》，卷 8，葉 1a、b。新州在今日廣東新興，而且似乎在俚一獠地區東界。

⁶⁷ 同前註，卷 12，葉 1a。番禺靠近廣州城。

⁶⁸ 同前註，卷 9，葉 6b。這應該發生在梁武帝大同年間（535-546）。

⁶⁹ 同前註，卷 21，葉 17a。這些「俚洞」很有可能位於珠江南岸。討伐俚洞的軍隊從廣州城出發，就在該地區北方屬於另一行政區時。

⁷⁰ 見 Geoff Wade, "The Lady Sinn and the Southward Expansion of China in the Sixth Century," in *Guangdong: Archaeology and Early Texts*, eds. Shing Müller, Thomas Höllmann, and Putao Gui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4), pp. 1-21.

⁷¹ Schafer, *The Vermilion Bird*, p. 69. 關於叛亂的相關研究，見該書，頁 61-68。

因此，初唐時的情況與六朝時期相差無幾。然而，薛愛華的研究顯示，嶺南地區的叛亂逐漸從舊俚一獠地區移往左江、右江的北邊、西邊。他的研究也告訴我們，西邊強大南詔國的興起，讓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唐代以後，俚一獠地區不再鑄造銅鼓⁷²，雖然俚一獠地區北方的其他人群仍維持這個習俗。假如俚一獠地區在此時期未被征服，為何其銅鼓文化會消失？此處的原因可能與紅河三角洲的情況極為類似：此時的地方統治階級不再視銅鼓為一個珍貴的地位象徵，反而偏好代表帝國權威的封賜。其次，薛愛華提到的馮、甯部族領袖是一個新統治族群的代表，與早期那些無名俚一獠首領的出身不同。如同紅河三角洲的李、杜家族，馮、甯是地方豪族，並且是華夏人群與本地人通婚的後代⁷³。儘管馮、甯家族涉入叛亂和地方權力鬥爭，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可能更接近帝國官員的生活方式，多過於早期擁有銅鼓的地方首領。

結論與反思：國族史與區域史中的俚一獠

俚一獠人的故事挑戰了越南、中國關於歷史的主流國族敘事。如上文所示，揭開俚一獠人在六朝時期的過往，顯示出一個傾向，其傾向既不同於越南對他們如何不斷反抗漢至隋政府以追求獨立的美化，也有異於現代中國的國族迷思，亦即讚揚中國文化透過族群融合與互動的和平方式以拓展其影響範圍。倘若我們比較「中國化的」三國、六朝時期的俚一獠地區與當代「越南化的」紅河平原，關於反帝國的抵抗和反叛的歷史書寫，正好與國族史的內容相反。在十世紀獨立前的千年歲月裏，紅河三角洲的地方首領多半都在接二連三的與北方政權打交道。與之相反，大部分的俚一獠地區不受外人統治，而且遲至唐代，現今廣西南部、東部的人群方才臣服。即便如此，政府依舊強烈仰賴「羈縻」手段，也就是將權威委託給地方首領，而非依賴中央任命的官員。隨之而來針對俚、獠的軍事行動，也印證了現代關於中國史上和平族群融合的說法有多少意識形態成分的存在：中央政府長年來採取

⁷² 根據《嶺表錄異》的記載，人們在高州挖出銅鼓，並認為是稀有之物。此事暗示該地已停止生產銅鼓。見蔣廷瑜〈粵式銅鼓的出土研究〉一文。

⁷³ 馮氏家族是作為南朝陳高涼郡太守馮寶與冼夫人的後代而著名。合浦、鬱林地區的甯氏家族是一名梁朝鬱林太守的後代。見楊豪：〈嶺南甯氏家族源流新證〉，《考古》，1989年第3期，頁269-273。

血腥的軍事征服，為的就是將俚、獠納入帝國版圖。

我們無法在此時期的東京灣劃下一條清楚的界線，無論是依照現代的分類範疇，如東亞、東南亞，或者依照「漢化」的線性發展，抑或是所謂的前國族的「越南人」民族意識的連續性。相反地，俚一獠的故事說明了該地區的歷史便是一個互動交流的人群與中央政權對彼此的影響，可以深刻地——雖然常常無意識地——影響周邊人群的未來走向的例子；也是一種遙遠帝國中心的勢力擴張與否，皆能影響區域性的或在地的交流的方式。倘若如此，俚一獠的故事證實了 Denys Lombard 的論點，也就是討論東南亞時無法不將中國南方納入討論，反之亦然，特別是在這段時期⁷⁴。

俚一獠的故事發生在華夏政治、軍事勢力在漢帝國曾征服的西南領土縮減的整體結構中，其地即環交趾洋地區 (Jiaozhi Ocean rim)，從今日雲南到廣西，以及越南北半部。相對而言，漢帝國很快地控制了這個地區的大部分土地，但漢代之後的帝國卻難以在此地立足。當他們逐漸退出此地時，新的勢力崛起，包括建都於現今雲南的南詔和大理，以及越南中部的林邑與占婆，連帶還有一些雖無法形成大型政權但仍能不俯首於帝國的小地區。雖然漢帝國不費什麼力氣便掌控了紅河、珠江地區，但漢之後的帝國卻連管理廣州城周遭地區都有困難。問題之一在於，南方的華夏人群相對稀少，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南海、合浦、交趾等城市。在這些地區之外，分身乏術的東漢政府被迫放棄海南、左江上游地區等較小的前哨。

合浦、交趾等重要的貿易中心，可以經由海路抵達，而這些地方的奢侈品貿易，也讓帝國政府認為，值得花精力加以控制。如李塔娜 (Tana Li) 在本書第二章所揭示的，在這段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裏，交趾是南方最大、最富裕、最複雜的城市。但俚一獠地區的存在，加上其崎嶇地形、好戰傳統與足以支持長期獨立的經濟基礎，使得交趾在漢以後孤立於帝國之外，將其轉變為遙遠的行政孤島⁷⁵。

憑藉著掌握幾世紀以來富裕且人口眾多的紅河三角洲與六朝帝國之間直接、規律的陸路交流，俚一獠事實上在無意間催生了日後越南的獨立。透過將正常帝國交

⁷⁴ Denys Lombard, "Another 'Mediterranean' in Southeast Asia,"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1 (2007): 3-9, http://csds.anu.edu.au/volume_1_2007/Lombard.pdf.

⁷⁵ 何肯 (Charles Holcombe) 同樣稱紅河三角洲為「文明的綠洲」(oasis of civility)。見 Charles Holcombe, "Early Imperial China's Deep South: The Viet Regions Through Tang Times," *T'ang Studies* 15-16 (1997): 125-156。

流限制在大規模軍隊，或各種經由海路的活動，俚一獠的不妥協促成了交趾地方領袖內部一股自治潮流的誕生與發展，其結果將是十世紀一個越王國的獨立建國。

